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当代中国城市—区域

权力·空间·制度
研究丛书

主编 □ 刘君德

CONTEMPORARY
CHINA
CITY

权力空间过程与 区域经济发展

胡 德 ■ 著

Quanli Kongjian

Guocheng

Yu Quyu Jingji

Fazhan

 东南大学出版社
SOUTHEAST UNIVERSITY PRESS

014033270

D63
273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当代中国城市—区域：权力·空间·制度研究丛书

主编/刘君德

权力空间过程与区域经济发展

胡 德 著



D63
273



东南大学出版社
SOUTHEAST UNIVERSITY PRESS

· 南京 ·



北航

C1721463

内容提要

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是中国经济改革所取得的最直接、可观的成果。本书立足政治地理、行政地理的分析视角,探讨了经济转型时期中国国家(政府)与快速工业化、城镇化之间的权力作用关系:从中央层面看,在各地工业化与城镇化相互促进、互为激发的过程中,中央政府根据发展实际通过权力空间配置、行政机构改革、行政区划调整等方式,不断调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关系格局和权力实践目标,形成对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强有力的导引性和调控性力量;从地方层面看,转型时期各级地方政府利用分权化改革从中央政府获取和分享的行政权力,立足行政辖区范围,组织地方资源,推进当地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

本书可供人文地理、经济地理、城市规划、城市与区域研究人员学习,亦可供高校相关专业的师生阅读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权力空间过程与区域经济发展/胡德著. —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4. 2

(当代中国城市—区域: 权力·空间·制度研究丛书/刘君德主编)

ISBN 978-7-5641-4696-2

I. ①权… II. ①胡… III. ①国家行政机关—行政管理—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研究—中国 IV. ①D625 ②F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306551 号

书 名: 权力空间过程与区域经济发展

著 者: 胡 德

责任编辑: 徐步政

编辑邮箱: xubzh@seu.edu.cn

文字编辑: 唐 允

出版发行: 东南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四牌楼 2 号

邮 编: 210096

网 址: <http://www.seupress.com>

出 版 人: 江建中

印 刷: 兴化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排 版: 南京新洲印刷有限公司照排中心

开 本: 700mm×1000mm 1/16 印张: 19.75 字数: 329 千

版 次: 2014 年 2 月第 1 版 201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41-4696-2

定 价: 59.00 元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发行热线: 025-83790519 83791830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东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营销部联系
(电话: 025-83791830)

当代中国城市—区域:权力·空间·制度研究丛书

学术委员会:

- 陆大道 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
胡序威 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研究员
杨汝万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崔功豪 南京大学教授
邓伟志 上海大学教授,原全国政协常委
王邦佐 原上海市社联主席,上海政治学会名誉会长,教授
刘君德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主任

编写委员会:

主 编:刘君德

编委会成员:刘君德 靳润成 舒 庆 曾 刚
谷人旭 华林甫 袁中金 林 拓
刘泽勤 陈占彪 蒋长瑜 周克瑜
陈玉慧 黄 璐 范今朝 曾万涛
顾春平 卢为民 陈先毅 薛 莹
史卫东 马祖琦 殷为华 胡 德
贺曲夫 刘 焱 马海龙 李潭峰
洪世键 孙 鹏

总序

中国行政区经济理论的缘起、发展与未来

城市—区域问题是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中极其重要的命题,也是我国人文社会经济科学学者们长期关注的领域。改革开放以来,我从事的城市—区域问题的研究主要侧重于行政区划视角。

我从1983年开始介入行政区划问题,1989—1993年提出“行政区经济”概念,随后又提出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的“行政区经济”理论,至今已经有25年多了。2008年,我与我的部分学生们一起认真商讨和策划,决定与东南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当代中国城市—区域:权力·空间·制度研究丛书》(以下简称《丛书》),意在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区经济理论注入新的活力,并从权力·空间·制度视角对当代中国城市—区域发展问题进行新的探索。如今,经过近3年的筹划与准备,《丛书》终于问世了!

在《丛书》出版之际,我作为“行政区经济”这一概念和理论的创始者,很有必要就行政区经济理论形成的来龙去脉和相关问题作一些说明,这对那些有志、有兴趣介入行政区经济理论建构的同志,或希望能够利用行政区经济理论来揭示或解释当代中国各种城市—区域的社会经济文化现象或问题的同志以及规划、建设管理部门的同志们来说,可以提供更为清晰的学术发展思路。

这里,我主要循着行政区经济理论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就四个方面作一些简要说明:(一)我对行政区划问题研究的缘起是什么?我是怎么提出“行政区经济”理论概念的?(二)以新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为标志的“行政区经济”理论体系与内容框架形成的实践工作与理论建设这两个方面做了哪些重要工作?(三)行政区经济理论体系还有哪些重大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与思考?(四)“行政区经济”理论可否适应未来世界各国行政区划问题的研究?(或者说,行政区经济能否作为一种理论思想向更深、更广的方向不断拓展,使行政区经济具有更广泛的解释力?)通过对这四个相互关联的问题的回答,以期引起大家对行政区经济理论的进一步关注、思考;也希望行政区经济理论能够在本套《丛书》的相关专著中得以

发展、深入。

在世界人类文明发展史上,行政区划是关于国家政治、行政体制与地域空间相互耦合的重要文化成果之一。行政区划的建立不仅关系到国家与社会的长治久安与繁荣稳定,而且关系到国家行政结构的组织方式,关系到国家区域权力空间结构的发展趋势与调整方式。因此,行政区划问题不仅表现为一种外在的区域政治权力的空间投影,而且体现了一种内在的政治思想方式与内涵。

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无论从我国古代王朝时期的封建帝制到皇朝时期的郡县制与行省制,还是近代以来政党时期的民主制,怎样解决从古到今的朝代更替或政党执政问题,一直是人们孜孜以求的政治理想。我国古代的行政区划问题就是每每伴随着王朝兴衰更替而不断调整的。从我国古代历史看,每一次王朝更替之后,都会在行政区划体制方面发生重大变化。反过来说,每一次大的行政区划体制的调整,都是为了及时适应国家政治与行政体制改革方面的重大改变。

1983年,我被委派担任中国科学院南方亚热带丘陵山区综合科学考察队第三分队队长,1984年起在安徽皖南山区、浙江省西部和南部山区以及福建省闽江流域开展丘陵山区的综合科学考察工作。在皖南贵池县考察时,当时的贵池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向我反映,贵池县发展的主要问题是行政区划问题,希望考察队能帮助他们解决或向有关部门呼吁。这让我感到很意外,也引起了我的关注。但因为我们当时并没有行政区划方面的科考任务,所以,在结束贵池科考任务的第二天,我就留下两位同志,一起就行政区划问题进行细致、深入的调研,重点考察被当地称之为“三国四方七十三家房客”的多头管理体制问题以及撤销池州地区、将贵池划归长江北部安庆地区管辖后的影响问题。我们认真听取了当时贵池县有关部门和方方面面的意见,并对行政区划与管理体制现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实地考察。之后,我带着问题回到了上海,在完成有关皖南综合科考报告的同时,对贵池县行政区划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确实觉得贵池县乃至整个皖南地区都存在着行政区划变动频繁、撤并随意、层次重叠、部门林立、条块分割、多头管理等问题,严重影响了机关工作效率,浪费了行政经费,使一个文化历史悠久、开发建设条件良好的贵池在城市一区域经济发展方面受到重重阻力。我当时深深意识到,由于行政区划体制造成的无谓的资源浪费现象和经济发展缓慢、城市建设无序等问

题的严重性,让人十分痛心!

在这种情况下,我与几位同志商议决定以考察队的名义向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上书(华师科[1984]第106号文《关于安徽省贵池县经济体制问题的情况与建议》),力陈安徽省皖南地区贵池县行政区划存在的问题,希望能给予解决。出乎意料的是,仅仅过了十余天时间,华东师范大学党委就转来了有关领导的批示,肯定了我们所反映的意见。这件事给了我莫大鼓舞,也使我决定对行政区划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并就安徽省的有关行政区划问题给予了持续关注。1985年5月,我再次带领考察队员对皖南地区的行政区划问题进行专题深入调研,发现大量问题,写成2万余字的专题文章:《安徽省皖南地区行政区划体制的调查与思考》,作为考察队的重大成果发表于《安徽省南部丘陵山区国土开发与整治》的专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中,该文又被收录于《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1986年11月,考察队赴福建闽江上游建溪流域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综合科学考察,同样发现这一地区存在行政区划与行政管理体制问题,遂于1987年2月以书面报告(《关于福建省建阳地区行政区划及闽江委员会体制等情况的情况与建议》)向福建省有关部门作了反映,同样得到了积极回应。

这可以说是我开始对行政区划问题进行研究的缘起。

1989年,我们完成了南方亚热带丘陵山区的综合科学考察任务,出版了一系列重要成果。1990—1991年,在全国大规模开展国土规划的背景下,我多次受邀参加了安徽省计委召开的有关地区(黄山、安庆、池州、宣城、合肥等地市和安徽沿江带等)国土规划评审会,在会上,我根据多年考察的经验体会与发现,指出了行政区划体制因素对中国国土资源开发、城市—区域经济发展的强烈影响,提出了“行政—经济区”的概念。我认为:“这种行政—经济区对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起着主导作用。然而正是行政—经济区,在地方分权体制下,使各级地方经济发展追求‘大而全’或‘小而全’,导致区域经济的封闭性特点,从而对整体经济的发展带来消极影响。”(专文《关于我国行政区划体制问题的初步探讨》发表于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行政区划研究》)。1992年,在广州召开的“全国首次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地带行政区划研讨会”上,我进一步强调了中国转型期行政区划的重要作用,明确提出了“行政区域经济”的概念,阐明了随着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行政区域政府的经济功能将逐步淡化的观点。1993年,我与我的第一位博士生舒庆

同志合作在《经济地理》第1期上发表了《论行政区划、行政管理体制与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一文,首次比较系统地对行政区经济的结构特征和淡化行政区经济功能等问题进行了论述。这可以说是我对行政区经济概念的提出阶段。

二

随着我们对行政区划研究的不断深入与“行政区经济”理论在学术界和政府部门引起的积极反响,特别是基于行政区划改革的必要性与紧迫性,1990年,经国家民政部批准,在华东师范大学成立了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迄今为止,这是国内唯一的专门从事行政区划问题研究的专业研究机构。

如果说“行政区经济”理论的提出,是意图把我国现行行政区划现实问题研究推进到理论认识阶段的话,那么,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的设立,则为我国行政区划体制问题的系统深入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组织平台。在国家民政部的关心指导下,在华东师范大学党政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我作为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的“领头羊”,在这一阶段与我的历届学生们(包括9名与我合作的博士后)一起,主要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积极投身行政区划现实问题的实证与论证、规划工作及理论研究,完成了一批较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为中央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的行政区划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供了决策依据。这主要表现在我与我的学生们一起,在近20年的时间里,先后完成了40余项与行政区划相关的课题。最主要的有:“江苏省苏、锡、常地区行政区划改革研究”、“江苏省‘三泰’地区行政区划调整研究”、“海南省设市预测与规划”、“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行政区与经济关系综合研究”、“浦东新区行政区——社区体系研究”、“我国国民经济分级调控空间组织模式可行性方案研究”、“中国大都市公共行政组织与管理模式研究”、“上海创建国际大都市的行政区划改革研究”、“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行政区划体制改革与创新研究”、“关于海南省调整海口市行政区划方案的论证报告”等。其中,“江苏省苏、锡、常地区行政区划改革研究”获全国高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995),“上海行政区划体制改革与浦东新区建制镇区划调整及城镇发展战略研究”获上海市第四届决策咨询研究成果一等奖(2001),“关于海南省调整海口市行政区划方案的论证报告”(2002)作为附件上报国务院,获得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和海南省政府的高度评价,不久

海口市行政区划及时得到调整。

与此同时,我还参加了民政部组织的“全国设市预测与规划”和各省(区)的设市预测与规划的系列成果评审,以及山东、江苏、广西、广东、湖北、安徽、新疆、贵州等省区有关城市发展和设市预测规划的考察活动,掌握了大量资料和有关情况。通过这些实践活动,使我深深体会到行政区划问题研究的重要性、紧迫性和艰巨性、敏感性,也使我对“行政区经济”理论概念的有效性和解释力更有信心。

二是在大量研究实践的基础上,经过不断总结、提炼和萃取,行政区经济理论体系初具雏形,随后建立和完善了“行政区经济”的理论概念与框架内容,并在“行政区经济”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行政社区”的概念和构建大城市自上而下“行政区—社区”管理体系的理论思维,使行政区经济理论体系更加丰满,更具有实践性。主要标志是出版了由我主编、我国首部以“行政区经济”冠名的《中国行政区经济与改革丛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这是一套力求符合中国国情、理论与实证结合的区域经济与管理及行政区划丛书。

这一时期,我们先后出版了20部约450多万字的一批学术著作,初步展现了行政区划、行政区经济及其相关理论的学术成就。主要包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刘君德主编的《中国行政区划文献目录》(1992)、《中国行政区划的理论与实践》(1996),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舒庆著《中国行政区经济与行政区划研究》(1995),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刘君德与靳润成、周克瑜编著的《中国政区地理》(1999,2007)和刘君德与靳润成、张俊芳编著的《中国社区地理》(2004),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舒庆、周克瑜著《从封闭走向开放:中国行政区经济透视》(2003)、汪宇明著《中国省区经济研究》(2000)、王德忠著《企业扩张——理论研究及其对中国行政区经济问题的应用分析》(2002)、刘君德、冯春萍、华林甫、范今朝著《中外行政区划比较研究》(2002)和程玉申著《中国城市社区发展研究》(2002),以及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刘君德、汪宇明著《制度与创新——中国城市制度的发展与改革新论》(2000)、卢为民著《大都市郊区住区的组织与发展——以上海为例》(2002)、黄珏著《国外大都市区治理模式》(2003)、张俊芳著《中国城市社区的组织与管理》(2004),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周克瑜著《走向市场经济——中国行政区与经济区的关系及其整合》(1999)、林涛著《国民经济区域调控——中心城市调控模式研究》(2000),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张玉枝著《转型中的社区发展——政府与社会分析视角》(2003)、陶希东著《转型期中国跨省市都市

圈区域治理——以行政区经济视角》(2007),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陈湘满著《中国流域开发治理的管理与调控研究》(2003),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的秦学著《旅游业跨区域联合发展的理论与实证研究》(2004)等。

上述两个方面,前者侧重于实证研究、方案论证和理论研究,后者侧重于理论梳理和系统阐述,二者相互支撑、相互配合。通过实践与理论的有机结合,基本建立起“行政区经济”的理论体系框架。在我的第一位博士生舒庆的博士论文中比较系统地阐述了行政区经济的基本概念与理论内容。所谓“行政区经济”是指由于行政区划对区域经济的刚性约束而产生的一种特殊区域经济现象,是我国在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区域经济由纵向运行系统向横向运行系统转变时期出现的具有过渡性的一种区域经济类型。现阶段,我国“行政区经济”主要表现为以下特征:①企业竞争中渗透着强烈的地方政府经济行为;②生产要素跨行政区流动受到很大阻隔;③行政区经济呈稳态结构;④行政中心与经济中心的高度一致性;⑤行政区边界经济的衰竭性。

作为一个科学概念,“行政区经济”深刻揭示了我国转型期区域经济运行本质特征与规律。由于“行政区经济”这一概念对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因行政区划而导致行政壁垒和地域分割的经济现象有着极强的概括力,从而被国内(乃至于海外的部分高校)一些学者和政界接受、引用。

自此以后,打破行政壁垒和地域分割,要求淡化政府直接干预行政区的经济功能、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的呼声越来越高。这可以说是以建立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为契机,以培养跨学科人才为目的,并通过大量实地考察、政策研究、区划方案论证和论著撰写等,从而使行政区经济的理论体系与框架逐渐深化和得以推广,这可以称得上是我推进行政区经济理论发展的第二阶段。

三

自“行政区经济”理论提出以后,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面临新的形势下,要求打破区域分割、推动区域联动发展、努力消除我国“行政区经济”负面影响的呼声也日渐高涨。事实上,正是在我与我的学生们形成的这个学术集体以及许多认同行政区经济理论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使得“行政区经济”理论客观上在积极推动我国城市—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与规划、建设管理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影响作用。

研究认为,中国行政区经济的形成,与我国历史上的地方经济发展状况有关,而地方经济发展的传统又主要受三个因素的影响:①我国地域辽阔,自然条件和经济技术发展水平的地域差异大,拉开了地区之间经济收益的差距;同时,过于单一狭窄、传统的各类经济组织形式,阻碍了有组织市场的发育,导致难以形成全国性的统一市场。②国家统一,长期稳定,也使以省区为主的地方经济的各自发展成为可能。③我国市场发育状况决定了我国区域经济较低的联系水平,也导致我国经济长期被排斥在世界经济体系之外。上述因素使我国的地方经济往往囿于行政区域的范围内,呈现“封闭”式运行状态。

中国行政区经济形成的基础主要有两点:①传统形成的封闭式的省区经济使省区内外的经济差异逐步扩大,省区经济的稳定性进一步增强;②长时期科学技术水平低下和交通运输、通讯条件落后,减弱了区域经济在更大空间和更高层次的聚合程度。以上两点加上其他一些历史、政治、文化因素,为行政区经济的孕育、发展提供了温床,同时也成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桎梏。

行政区经济理论还认为,新中国成立以后,在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央与地方条块关系变动环境下,行政区经济是以潜型形式存在的,一旦“条条”与“块块”之间的权力关系发生转移,即当“条条”与“块块”关系的平衡点向“块块”一方略有倾斜时,客观上就为行政区经济的强化创造了可乘之机。“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给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也为行政区经济运行提供了基础。

行政区经济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形成和发展的,新时期以来形成的区域经济冲突就是行政区经济在不同发展阶段运行的结果。我国的行政区经济运行大体上可以分为五个阶段:①1979—1984年,是“分灶吃饭”等改革措施下的盲目布局与引进阶段;②1985—1988年,是价格双轨制下的“原料大战”阶段;③1989—1992年,是紧缩政策下的市场疲软和封锁阶段;④1992—1997年,是金融秩序混乱和经济过热阶段;⑤1997年以后,是经济“软着陆”之后保护局部利益阶段。我们的研究认为,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如采取市场经济体制的美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原苏联和混合经济体制的印度相比,它们都难以形成与中国行政区经济发育不相上下的土壤环境。因此,中国行政区经济是世界上表现最为突出的国家,也就是说,行政区经济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这主要表现在它有其独特的运行方式,即以企业为微观运行单位,在权力空间地域上和不同的行政区层次上表现出不同的特点。行政区经济理论认为,一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立,

行政区经济势必逐步瓦解,一种新型的区域经济关系将会形成、发展,但这可能还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然而,随着对行政区经济理论认识的不断提高、行政区经济内容框架与理论体系构建的完善与发展,尤其是在对我国现阶段城市一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建设管理中存在的“行政区经济”现象已经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和阐释效应的情况下,我认为仍有必要深入思考“行政区经济”理论的适用范围、理论扩展与深化提升的问题。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还需要回答:

(1) 行政区经济对我国当今转型期的城市一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诸多特殊现象虽然已经有了较强的阐释力,但由此我们不得不进一步思考:我国的行政区经济现象只是在现阶段才有的吗?如果上溯,我国古代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有没有区域分割现象?如果有,这种区域分割现象是不是行政区经济现象?如果不是,那这种区域分割现象又怎样来解释?能不能运用行政区经济理论解释我国古代区域经济发展变迁中存在的由于行政区划引起的有关区域分割现象?

(2) 行政区经济理论是以西方市场经济理论体系为参照系的。那么,是不是只要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起来,行政区经济现象也就自然消失了?事实上许多人在引用行政区经济理论概念进行分析时往往也只看到其消极影响一面。人们要问,从我国城市一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来看,行政区经济到底有没有积极意义,或者正面效应?我们发现,行政区经济理论在经过实践不断检验的过程中,从区域经济理论发展动力、运行机制与运演过程来看,我们原来对行政区经济的正面的积极意义挖掘得不够,影响了对问题阐释的力度和全面性。事实上,仅以市场经济为唯一标准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市场经济也会失灵,在市场经济失灵的情况下,以国家干预为核心的市场经济与行政区经济有怎样的关系?而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也证明,如果没有以地方政府为主体的行政区域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改革开放 30 年要取得这样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成就,那是难以想象的。因此,我们的研究认为,与通常人们所说的“诸侯经济”不同,中国转型期的行政区经济存在着“褒”(积极影响)“贬”(消极影响)双重属性,“行政区经济”的正、负面影响将伴随中国整个转型时期长期存在。如何不断扩大行政区经济的正面效应,逐步减弱行政区经济的负面影响,则是我们下一步研究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3) 行政区经济主要是以我国新时期以来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区域经济现象为研究与解释的对象,这也是行政区

经济理论体系广为接受的原因所在。但与此相关,让我不能释怀的是:在原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是否也存在行政区经济现象?2005年的12月,乌克兰驻华使馆的一位高级参赞在看过我们的行政区经济论著后,专程来沪找我,和我讨论行政区经济问题,他说,像中国现阶段存在的“行政区经济”现象在乌克兰也是存在的,并指出,乌克兰也要推进行政区划体制改革。近年来,我国香港和台湾地区也不断有学者来访,并邀请我赴港、台宣讲行政区经济理论问题。事实上,我国香港、台湾地区,乃至美国等一些大学已经有不少学者关注中国内地的“行政区经济”理论问题,包括在研究生的论文选题中将行政区划和行政区经济问题作为重要研究内容。这不得不促使我更进一步深入思考,是否在全球范围内也普遍存在行政区经济现象?除了东欧国家,我们可以而且有必要作为一种比较性的研究对象外,欧盟是否也可以作为一个案例进行深入研究?全球有230多个不同政治体制的国家,是否也可以尝试用行政区经济理论进行探索性研究呢?更为重要的是,如何通过这种研究把我们的行政区经济理论与国际上通行的制度经济学理论、区域政治学与区域社会学理论以及城市—区域治理理念等相关的现代学术思想进行对接,也许这将是我们需要长期开展并与海外学者合作研究的重要命题。

从这个意义上看,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入推进与不断完善,我们开创的“行政区经济”理论也面临着不断创新与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它促使我们很有必要把“行政区经济”从一个理论体系框架提升到一门独特学科体系的高度,进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政治经济学,这不仅是我国改革开放30年的一个重要学术思想成果,而且对研究现代世界国与国、地区与地区、各国内部地区之间乃至国际性区域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类组织的区域空间权力结构与制度整合,将会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如果站在这一高度看问题,我觉得更有必要把行政区经济理论体系逐渐向海外拓展,以此作为新的起点,进一步推动行政区经济理论研究走向新的更成熟的阶段。

四

我曾经说过:“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的确立,如何建立一套与之相适应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的社会主义行政区划体系,是一项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的科学研究工作,同时也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任务。一方面,它要依靠行政区划的实践,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

从而摸索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行政区划改革新路子;另一方面,也必须要有科学的理论作指导,即依靠科学的理论思维,把握事物的本质与规律,从而指导我国行政区划的实践。”

《周礼》说:“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意思是说,建立一个国家,先要分辨清楚地理方位,然后划分行政区域,在此基础上,再分设官职,建立行政组织结构,以完成管理百姓的措施。如此简括的几句话,把国家建构的过程与要点勾勒得清清楚楚。由此可知,行政制度的建立,最根本的乃是行政区划与行政组织结构的耦合。但是,行政区划与行政组织结构又是根据什么确定的呢?二者之间又是怎样耦合的呢?这就必然涉及政治与行政制度的确立。用现代政治与行政理论来分析,就是先有权力主体,这就是政治与行政组织结构;而权力主体不可能是个空中楼阁,而是必须将其奠定在特定区域地理空间的基础上才更加坚实牢固。当国家一旦建立起来并运转的时候,它又不是随意的,而是必须根据特定的政治与行政制度,从而达到权力主体在特定社会空间良性运行的根本目的。我认为,行政区经济理论的第三个发展阶段,就是必须更加扩大和延伸学术视野,从区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系统整合的意义上,推动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区经济理论思想的建构,这也就是本书之所以命名为“当代中国城市—区域:权力·空间·制度研究”的根本所在,也是行政区划与行政区经济理论的新的学术增长点。

当然,随着现代政治、经济与社会不断发展,人们对权力、空间与制度的认识已经有了很大变化。权力不再仅仅指单一的行政权力,而是扩展到了整个社会层面,这是由于现代行政的主体已经由政府扩展到各种企事业单位乃至群众团体,这必然导致权力的生产与再生产模式将面临一场重大变革。而空间也不再只仅仅是地理空间和空间差异问题,而是深入社会空间的各个层面,在一定意义上,社会空间的生产与再生产已经深刻改变了传统的对地理空间与空间差异理论的一般认识。同时,由于权力空间结构在要素排列上的深刻改变,这对权力空间秩序的生产与再生产形成了重大影响,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整个世界,新的权力空间秩序正在形成之中,因此,应积极寻求在新秩序建构的过程中,成为制度与规则的制定者之一,而不仅仅是一个模范的制度执行者。在这个意义上,建构以行政区经济理论为核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目的,就是为了根据不同侧面的空间尺度,对多元权力结构的行政权力与运行机制进行探讨分析,从而在特定的区域权力空间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

如果说,时间是主导现代主义世界的话,那么空间化逻辑则主导着后现代社会。从过去到现在,人们已经认识到,在权力与空间发生作用时,空间的重要性得到了很大改变。福柯就明确地提出:空间是任何公共生活形式的基础,空间是任何权力运作的基础。因此,空间已成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关系的重要一环。空间是在历史发展中产生的,并随着历史的演变而重新结构和转化。后现代空间化问题,在当代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中已得到深刻反映。全球城市已成为经济、政治和文化权力重合的地方。这一观点实际上也得到了来自于城市政治学研究的大力支持。城市政治学是社会学科中的政治学分支领域,其研究的焦点问题就是城市公共决策的权力结构。在城市政治学的研究传统上,有两种城市政治结构模型:一是城市社区权力的“多元模型”(pluralist model),即认为城市内各种社会群体与利益集团共同对城市的公共决策发生影响;二是“精英模型”(elitism model),认为城市的主要公共决策是由少数精英分子和大的社会经济结构所决定的。但从主流模型的衍变来看,城市多元化的权力结构模型更成为与空间化逻辑主导形式相适应的一种主要模型。因此,努力发掘权力结构的空间化逻辑主导形式,就成为分析行政组织结构的行政空间与权力空间相互关系的生动起点。

而以我国行政区划与行政组织结构为核心的行政区经济理论体系,它的最大价值恰好在于它发现了我国以行政区域为单位形成的一种区域权力在空间经济的运行模式中所产生的各种现象,包括权力、空间与制度自身的各种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行政区经济理论不仅是揭开我国当代最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一把钥匙,而且其最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前景也在于对于未来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怎样通过以世界各国行政区划与行政组织结构之间的耦合关系研究,对现代国际区域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中国学者应有的世界性贡献。

最后,我要对本丛书的出版情况作一点说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先后出版了20本著作以后,近几年陆续又有一批由我指导的博士生通过了论文答辩,其中,有些学术成果已经问世,有的尚未出版。同时,近几年,还有国内其他学术领域的学者也主动与我联系;有的则通过各种渠道让我了解到他们也在应用行政区经济理论对不同的领域进行学术研究工作。因此,我希望能继续通过丛书的方式把这些成果比较系统地推出来,贡献给理论界、学术界和实践部门,让理论在实践中不断得到验证、深化和拓展。于是,经过与东南大学出版社的讨论、策划和历时3年的运作,这套丛书终于面世了。

我们设想本套丛书的结构大体包括五大部分:第一部分偏重于当代中国城市—区域;权力、空间与制度的综合性理论研究;第二部分是权力、空间、制度视角的特定专题性研究;第三部分是权力、空间、制度视角的各类规划性研究;第四部分是当代中国行政区划改革研究;第五部分是我国几个大区域的综合性研究。上述五大部分相互配合形成比较完整的丛书体系,力求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和行政区经济理论思想的融合。

此次丛书出版强调两个方面,一是开放性,二是创新性。本套丛书除选择一批我近年指导完成的优秀博士论文外,还特别吸收别的学科和实践领域应用行政区经济理论进行研究的拓展之作,体现开放性;同时,还特别希望和鼓励能在理论上提出新观点的创新之作,即使在理论框架和思想观念上还不是特别成熟,我们也很欢迎,体现创新性。

我衷心希望,能够推出一批质量上乘、观念新颖的学术创新著作,能够有更多有志于行政区经济理论研究的同行加入进来,能够使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区经济理论思想更加成熟!

本套丛书得以顺利组织、写作、出版,决定于两个因素:一是众多作者经过多次讨论形成的共识与全力以赴;二是国家民政部行政区划与地名管理司、东南大学出版社以及华东师范大学资源和环境科学学院领导的大力支持。非常荣幸的是,我们请到陆大道院士、胡序威研究员、杨汝万教授、王邦佐教授、邓伟志教授和崔功豪教授担任本丛书的学术顾问,他们都是不同学科长期从事城市—区域问题研究的国内外著名的专家、学者,他们的支持给了我们很大鼓励,也增添了新的动力。让我十分高兴的是,在丛书组织过程中,华东师范大学资源和环境科学学院人文地理学科被批准为国家重点学科建设项目与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项目单位,我们及时得到项目的支持,因此,这套丛书的出版也是“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地理学”(No. B410)项目重要的成果之一。

还要说明的是,中国行政区划与行政区经济理论是一个新的、具有探索性的研究成果,本丛书中的—些观点,特别是有关行政区划改革的设想只代表作者的看法,衷心欢迎各类学科的理论工作者与政府部门的实际工作者提出批评建议。

刘君德

前言

国家与市场,似乎从来就是一对天然的矛盾对立体。在经济发展中,国家(政府)的恰当作用是什么一直是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讨论中的一个核心论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的时候,两本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著作问世了。一本是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另一本是卡尔·波兰尼的《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和经济起源》。前者成为20世纪最后四分之一世纪里的自由市场革命的推动性力量,后者则因对市场自由主义最有力的批判而知名。两本书的立场和论点是如此对立和不同,但两本书最终都成为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经济学作品,反映出国家干预主义与市场自由主义之间的争论,直至全球化时代的今天依然保有价值。“在今天,我们已经能够达到一个更加平衡的立场,已经能够既认识到市场的力量,也认识到它的局限,认识到国家(政府)在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必要性,尽管大家对这种角色的边界还存在争论。”^①

对应于中国经济改革,我们应当如何认识和看待转型时期国家(政府)的角色和作用呢?得益于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业绩表现,海内外的学者对于中国国家(政府)的作为大都给予了极高的赞誉。同时,归因于中国国内贫富差距、城乡差异日趋严重,人们对政府的批评也日渐增多,其中最有力的批评来自持新自由主义观的新制度经济学者,他们集中批评中国政府过多介入和干预经济,批评“国进民退”^②,一部分学者更是主张“市场从不失灵”^③。不可否认,这些批判意见大都客观且饱含智识,但作者认为更加客观和深刻的意见是“中国国家(政府)一定做了些很对的事”^④,不然何以解释1978年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为此,我们必须在更深的层面上加深对中国经济改革的认识,必须追问在转型时期,中国国家(政府)通过怎样的权力干预加快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本书将试图对这一问题作出回答,通过对转型时期中国国家(政

① 斯蒂格利茨在评价卡尔·波兰尼的《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和经济起源》一书时的表述。

② 代表性的学者如许小年。

③ 新制度经济学者薛兆丰的表述。

④ 周其仁、张五常等学者的表述。